

谢冕
著

中国当代诗歌札记

浪漫 星云

中国当代学院批评丛书

谢冕 主编 程文超 副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谢冕 著

中国当代诗歌札记

浪漫星云

谢冕 主编 程文超 副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蓝风箏

• 中国当代学院批评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漫星云:中国当代诗歌札记/谢冕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9

(蓝风筝·中国当代学院批评丛书)

ISBN 7-218-02920-5

I. ①浪…②蓝…

Ⅱ. 谢…

Ⅲ.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Ⅳ. I 027·25

书 名	浪漫星云 ——中国当代诗歌札记
作 者	谢 冕 著
责任编辑	陈 娟
封面设计	舒 杰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8.5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插 页	1
版 次	1999 年9 月第1 版第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2920-5/I·381
定 价	17.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 序

谢 冕

这套丛书的几位作者都来自学院，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获得了很高的学位——丛书中有好多部本身就是博士学位论文。而且，丛书的大部分作者，现在也都在大学或研究部门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套丛书的内容，是围绕着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基点展开的，可以说是属于广义的文学批评的范畴。因此，要是对这套丛书加以概括，指称其为《蓝风筝·中国当代学院批评丛书》，应该是很切题的。既然是学院批评，而且又与“当代”有关，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当然也乐于把话题集中在当代的学院批评精神这一点上。

学院在中国可以称之为高等学府，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在全体居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中国，学院这地方相对集中了拥有较多知识的人才，这本身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中国旧学也有学院的传统，那是以某一位或数位知名学者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书院制度。在这些书院中，通过那种课徒授业式的讲学活动，以交流学术、传播思想。书院在中国旧时的文化交流和学术发展中，特别是在倡导独立思想和建立学派方面，曾经起过非常大的作用。现代意义的学院，源起于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它发端于“戊戌变法”而逐渐完善于新文化运动，是现今综合性大学的雏形。

现代的学院是新型的综合性的高等学府，与世界各国的大

体制相近。在中国，这种集中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学院，往往是学术活动频繁、学术思想活跃的地方。这里也是产生新思想和新思维的场所，从这里发出的信息，往往能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对社会产生着积极而广泛的影响。在大学里酝酿和产生的先进的思想，往往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学院以及学院里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殊地位，已为近代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实。

中国学院的这种品质，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魅力的展现。学院的地位和它的实践，昭示着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由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的紧密联系，因而，在学院中形成的思想理念，总是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迅速或缓慢地对社会和人群产生着影响，积极地作用于现实的进步与民智的开发。

在文化未能普及的社会，学院的成员是经过严格筛选的。优秀人才的相对集中，使这里弥漫着浓厚的投入和参与意识。这种意识以表达广大民众意愿的社会理想为巨大支撑，它保留了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联。学院意识的成熟性，表现在它与社会盛衰、与民众忧乐的紧密联系上，它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最动人的一道风景。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清楚自己在全体民众和整体文化构成中的这种地位，他们总乐于承载启蒙和代言的重负——当然，是通过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生活在中国具体的环境中，他们有一种被选择的庄严感。这种庄严感诱发并产生了使命意识则是自然而然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总要求自己的工作有益于人、有益于世，他们有很强烈的社会功利心。在中国，学问从来都不“纯粹”。

学院是切磋学问的地方，当然与外界有不同之处。首先是，这里所进行的一切工作都与基于个人的创造性劳作有关——而且这种劳作偏重于精神的和思想的层面。这是一个与外面偏重于务实的世界相对游离的社会。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独立的，这里的工作立足于思考的独创性，它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掘一

个人的潜力，使每一个人的智慧发挥到极致。这里无保留地鼓励奇思异想和与众不同。

无论是求学还是治学，其核心是探求学理。学院精神之所以能对社会产生影响，究其实，就在于它的思想理念建立在科学思辨的基础上。它不排斥激情，而激情却诞生于冷静的分析，并以坚实的理性为前提。这里所进行的一切工作都面对着具体性，事实和材料无疑是立论的根本。把这推广到治学上面来，则一切的推论或判断都应当是有根据的。不务空谈，严谨求实，是这里不可更易的律则。

学院的基本使命在于发展。它不仅是接受前人的思考成果，而且有责任推广和发展前人的成果。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并非被动地接受，总是追求以自己的加入而使历史丰富。中国学术就是在这样的精神接力赛中得到延续。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成员都以能通过自己的思考和研究进入学术的创造性传统而引为荣耀。正是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和所理解的学院精神总与创新有关。说学院是做学问的地方，此话不错。但它是一道鲜活而浩大的长流水，靠的是源头的深远，也靠的是加入者的鲜活的输送。

回到这套丛书的话题上面来，这里集聚的几本著作涉及的内容，均立足于20世纪、特别关注于本世纪下半叶以迄于今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潮的研究观察。既然是以当代文学的观察为重点，这里当然充盈着对于现实的关注和激情，为它取得的成就，也为它曾有的失误。中国文学在本世纪所经历的一切，尤其是本世纪后半叶所经历的挫折，为近现代文学的历史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经验。时届世纪末年，文学则有亟待克服的积重和新的期待。文学需要回应生活提问的也更多。在这样的处境中，一方面，文学研究需要对以往的累积作出有效的清理，另一方面，则要以更多的毅力和锐气面对新的挑战。这无疑是当代的学院批评的严重

的任务。

本丛书的作者大体总与北京大学有关，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获得过北大的博士或硕士学位，他们是很有创造力和锐气的新一代学者。奚密教授情况略有不同，她是我的朋友，现在就职于戴维斯加州大学。她是中国当代新诗热心的研究者和权威的诠释者，她在这方面的贡献，得到国内和海外学界的公认。她的加盟为本丛书生色不少，在此，我谨向奚密教授致谢。本丛书的大量组织工作是程文超做的，我也向他表示谢意。当然，我还要代表全体作者向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丛书责任编辑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1999年2月16日，旧历己卯年正月初一，于北京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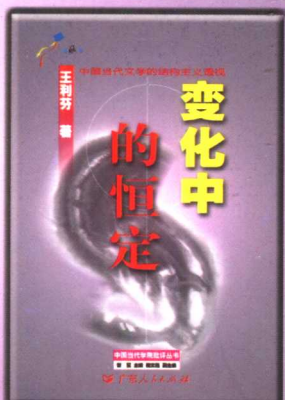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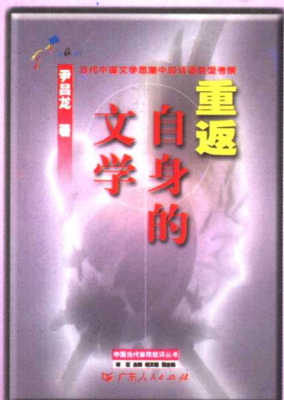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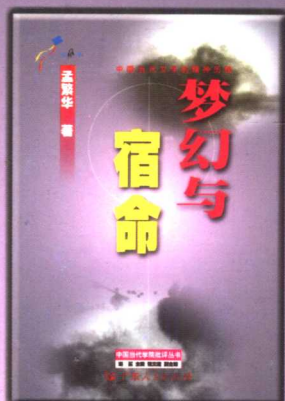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谢冕，福建福州市人，1932年生。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留校工作至今。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著有《共和国的星光》、《文学的绿色革命》、《新世纪的太阳》、《1898：百年忧患》等。

中国当代学院批评丛书

谢冕 主编 程文超 副主编



第一编 通论：特殊时空

第一章 新时代诗歌的 价值及局限

一、无可替代的发展和困阻

中国当代诗歌，指的是1949年以后的诗歌。它是“五四”新诗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五四”新诗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研究方便，以1949年为标志来划分诗歌。新旧中国的概念，是政体改变的概念，并不就是诗歌时代的概念。但是，1949年产生的这场政体改变既然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既然如此深刻而全面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就不能不带给诗歌以划时代的意义。

新时代使新诗产生了新变化，这些变化使新诗开始了与过去的阶段既有联系又是独自成立的新阶段。这种新变化的基本点首先是在诗歌与现实关系的改善上，“五四”新诗运动的根本起因是，人们已经感到旧体诗词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和生活的发展，它不能很好地表达人们在新生活中萌生的思想情感。变革的基本动因在于，在新的时代里诗需要寻求对于现实生活的更为合理的和密切的联系。

这种寻求，最初在文学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主张上得到了满足。后来，在以中国诗歌会为代表的诗歌走向现实的斗争中得到了发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不仅完善了“五四”运动以来的切近生活的努

力，而且直接地为当代中国诗歌奠定了基础。“讲话”是当代诗歌最初的、也是最主要的“设计师”。它以两部典型的诗集塑造了当代诗歌的最初形象，这就是作为史诗性的颂歌《王贵与李香香》与作为对于不合理的生活进行干预的战歌《马凡陀的山歌》。二者的相加，便是新时代的最进步的诗歌观念。这种观念，后来被明确定义为诗歌要为政治服务。在这样的观念下，诗歌不再是于社会人生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成为了变革和推进生活的及时而有力的工具，人们不再以单纯的享乐和审美的目光看诗歌，而是以非常实际的社会功利主义的目光看诗歌。诗歌的形象有了根本的改变：诗歌进入了生活的每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不仅成为政治旋涡中的最活跃的浪花，而且的确已成为整部“革命机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当代诗歌是在表现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直接号召下诞生和发展的。诗歌寻求自己的直接领地，那就是人们的感情世界。在新的时代里，诗歌表现新的感情，而且实践着新的抒发感情的方式。作为诗歌为政治服务的最直接的、也是最丰硕的成果，抒情诗高度地政治化了。随之而来的，是政治抒情诗这一诗歌体式的出现和日趋完善，它是一种抒发并不属于诗人自己的，直接为政治的利益和目标所激发的诗。它成为了一种最主要的诗歌体式（不是统一的，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样式的综合的体式）。政治抒情诗过去有过，但不曾成为如此重要的形式。政治抒情诗从出现到繁荣发展，是当代诗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

随着长期战乱的结束，加上全面开始的经济建设，为当代诗歌提供了极为宽广和丰富的题材领域。诗歌的触角伸向了过去未曾或是很少表现的范围，例如广阔范围内开始的新生活的前景，工业建设和边疆地区的风土人情的表现，开拓边疆的军旅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及民众结束奴隶地位争取新的生活权利的史诗性

的场面（这些场面是战争结束之后，生活开始安定的时刻，方才有可能较为从容地加以再现）。以前未曾有过的动人景象以及由此而生的喜悦和感激之情，决定了诗人要采取颂歌的方式创作，无数的颂歌题材涌向目不暇接的诗人，这就造成了歌颂新生活的热潮。歌颂的主题和歌颂的方式都有了深刻的发展。中国新诗史的颂歌时代于是形成了。它从另一侧面，展现了当代诗歌的独特形象。

尽管当代诗歌经历了长期的挫折，但它始终沿着歌颂社会生活的方向发展，而且始终试着实践并不断摸索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它无疑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对这种成就的概括的描写应当是：诗歌探索与现实生活的更为密切地结合的目的已经达到，它创造了一种与现行社会制度、时代气氛、生活实际基本上协调的诗歌形态。经过反复的试验和调整，它们彼此适应了，而且建立了某种稳定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不管遇到了多大的挫折，这种自觉不自觉的互相适应的诗歌与生活的关系并没有消失。

新的时代给新诗带来了新的矛盾，也正是这矛盾给当代诗歌带来了不同从前的若干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并不全是成就的说明，也许竟是弊端的症结。总之，它们是值得探索的主题，讨论当代诗歌的发展，如下三个问题是难以回避的：

（一）现实在当代诗歌中的地位。现实，指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在内。平常的和平常的社会生活，按照当时被确认为前进的诗歌观念的要求，诗歌应当积极地面对这个现实，并且为它服务，包括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当代诗歌的历史，几乎就是诗歌为政治服务的历史。它取得了很多成就，也由此产生了许多弊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在高度组织起来的、而且充满了多变的政治的社会生活中，诗人面对现实如何保持一个独立的严肃的态度，力求真实地面对并再现这个现实，而不是虚

假的。

(二) 个性在当代诗歌中的地位。诗人和诗歌的个性特征正在衰退。一种长久流行的褊狭观念，不断地贬抑和批判具有个性特征的“自我”，并把这贬抑地称之为“小我”，更通过片面地鼓吹以“大我”来代替“小我”，其结果是诗人的自我形象越来越模糊，抒情形象越来越趋于类型化和一般化。

(三) 多样的艺术表现在当代诗歌中的地位。当代诗界习惯于把有异于它的不同的艺术表现视为异端。它有着凝固的“传统”观念，随后这种“传统”的观念又被加上民族化、群众化的光圈。最后由于古典诗歌和民歌基础论的提出，迅速地形成了一种毋庸置疑和讨论的艺术标准，对被认为与这个标准相排斥（其实未必排斥）的一切都予以排斥。在新时期以前，当代没有多样的诗歌，只有统一或逐渐走向统一的诗歌。这个时期有这个时期的“统一”，那个时期有那个时期的“统一”，“小统一”之后有“大统一”。而且，这些走向一律的诗歌也只有一种大体统一的“风格”，完全谈不上艺术流派的存在与建立。在新时期到来之前，中国当代诗歌在艺术单一化的路上逐渐退化着。

二、挫折中的艰难行进

不要奇怪这里一开始就对诗歌的现状作了“暗淡”的描写，它根据的是当代诗歌发展的事实。但需要立即说明：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或者说，这只是事实的一个侧面。前面说过，1949年开始的当代诗歌是另一时代的诗歌，这不是随意性的判断，因为这一时代的诗歌的确出现了与“五四”前后的诗歌迥然不同的东西：诗歌表现的生活内容比以前更为广泛丰富，诗歌的题材有了新的开拓；诗歌与民众的关系更为密切；诗歌在整部“革命机

器”上的重要地位更为显著；诗歌的主题有了新的发展；诗歌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更富有时代感，当代诗歌中始终显示着一种作为社会主人公的形象；诗歌的形式有了新的拓宽，出现了新的、过去未曾尝试过的诗的形式，特别是政治抒情诗这一形式的确立和发展……更为重要的，作为一个诗的新时代的标志，当代有着属于自己时代的诗的星座，而这些星座不管存在多大的局限，却是前人无可替代的。

当1949年把中国新诗分成两半的时候，对比便自然地出现了。的确，前三十年的工作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是拓荒性的，我们前辈诗人以大勇大智的姿态用白话诗的“怪物”向着强大而巩固的旧体诗词发起攻击，战而胜之并取而代之。在这个持续甚久的抗争中出现了一长串让人难忘的、闪耀着诗的光辉的名字：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冯至、殷夫、何其芳、卞之琳、艾青、田间、臧克家……对比后三十年，诗歌的发展似乎十分艰难。它面临着新的障碍，想要逾越这些障碍是非常困难的。不少有成就的诗人都不得不为之辍笔或变相地辍笔，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批判和冲击。

从众多的事实中直率地揭示那些阻碍新诗健康发展的症结，探索克服那些弊病的途径，目的在于冷静而清醒地估计成绩，提高前进的自信力，着眼于未来，也许可以发展得更理智，也更健全一些。我们不愿重复历史的过失。在历史面前，我们只能尊重它。我们不能要求它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们只能说明它曾经这样曾经那样。当代诗歌的历史走过弯路，但是，它有属于自己时代的价值。对这些价值全面地加以论述是相当困难的。

久经苦难折磨而被迫停止歌唱达二十余年之久的艾青，当他从噩梦中醒来，他想到的仍然是——

最美的是
在前进中迎风飘扬的红旗

这是艾青 1978 年写的《红旗》里的诗句，与此同时，他写了富有斗争哲理的《鱼化石》：“动作多么活泼，精力多么旺盛，在浪花里跳跃，在大海里浮沉；不幸遇到火山爆发，也可能是地震，你失去了自由，被埋进了灰尘；过了多少亿年，地质勘探队员，在岩层里发现你，依然栩栩如生。”这首诗发表以后，有人问艾青它的意义，艾青狡黠地回答说：“这些年变成化石的人太多了。”艾青也许竟是自比。但他还算有幸，没有埋藏“多少亿年”便被发现了出来，而“依然栩栩如生”。

复生的艾青仍然是年轻的，中国老一代诗人有着十分可贵的韧性，这种韧性并不因为遭受厄运而消失。当然，与以前相比，艾青没有写出像《大堰河——我的保姆》那样深切的土地之歌，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力显得疲弱。但艾青国际题材的诗却取得了超越以往的成就。50 年代的《南美洲的旅行》、《大西洋》、《在智利的海岬上》，70 年代的《古罗马的大斗技场》、《莱茵河流过的地方》，以及其他一些国际题材的，关于维也纳、巴黎的诗，都使艾青获得新的荣誉。他是一位国际性的诗人。

写过《王贵与李香香》的李季和写过《王九诉苦》、《死不着》的张志民，他们 40 年代的诗篇，记述的是那个灾难年代农民的受苦和翻身的故事，他们是送别黑暗迎接新生的诗人。来到了新的环境，他们唱着新生活的歌，张志民唱着新的“村风”，写着新的《公社的人物》。而李季，他进入新生活初期的诗篇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新的改革，他以明快的旋律写着新的《生活之歌》，以及《玉门诗抄》中一些抒情短诗如《正是杏花二月天》：“正是杏花二月天，遍地麦苗像绿毡。汽车走在公路上，姑娘们